

鲁迅的社会批评发微

袁良骏

鲁迅生前一直倡导“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他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两地书》）。本文即意在阐发鲁迅的这一光辉思想。它通过对鲁迅大量书信、杂文的分析，论证了鲁迅对社会病态（主要是“黑色染缸”和“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揭露和对“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大力倡导，论证了鲁迅杂文、鲁迅书信的卓越成就对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不可朽价值及巨大现实意义。

作者：袁良骏，1936年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作为一名立志挽救世道人心的社会改革家，鲁迅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到了不能忘情的程度。鲁迅不愧为出色的社会病理学家，在他的笔下，描写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中国病态社会，为人们留下了一幅又一幅怵目惊心、血肉淋漓的病理解剖图。鲁迅小说、散文特别是杂文中的这种“社会录相”，早已为人们所熟悉；到鲁迅作品中作“录相遨游”，往往带给人们无尽的兴味和深沉的思索。鲁迅书信不同于他的小说、杂文，它们并非为发表而作。唯其为此，从中人们往往能够更为逼真地看到鲁迅对社会病态的激忿情绪，看到他在小说、杂文中想说而没有说出或已说而没有说尽的许多精彩的言论。

鲁迅一向认为，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黑色大染缸”，正象在《两地书》中他对许广平说的那样：“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象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①直到晚年，鲁迅仍然一再重申这一观点。比如，在1934年4月22日致姚克的信中他即写道：“中国人总只喜欢一个‘名’，只要有新鲜的名目，便取来玩一通，不久连这名目也糟蹋了，便放开，另外又取一个。真如黑色的染缸一样，放下去，没有不乌黑的。譬如‘伟人’、‘教授’、‘学者’、‘名人’、‘作家’这些称呼，当初何尝不冠冕，现在却听去好象讽刺了，一切无不如此。”^②一个月后，在《偶感》一文中，他又写道：

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③

那末，这个可怕的“黑色染缸”何以形成呢？鲁迅认为这正是长期封建专制统治的恶果。因为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都是最善于言行不符，名实不副，撒谎造谣，蝇营狗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的。在他们的影响下，自然出现了社会性的弄虚作假，巧立名目。外来的新鲜事物，先是极力排斥，妄图拒之于国门之外，待到排拒不成，便把它纳入自己的轨道，为我所用地放入“黑色染

①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第11卷，第20页。

② 《鲁迅全集》第12卷，第392页。

③ 《鲁迅全集》第5卷，第480页。

缸”，浸泡一番之后，便成为自己“济私助焰之具”了。比如照相术，本是人类一大发明，但中国人却用来拍烧香磕头，搞封建迷信；再如电的应用，以电刑代替旧刑具，虽不是中国人首创，但在肆虐上却创下了“光辉的”记录。就是中国自己的科学创造和发明，又何尝能免“黑色染缸”之祸？指南针不是我们发明的吗？外国拿去航海，而我们却拿来看“风水”，选择宅基和墓地。火药不也是我们发明的吗？外国拿去造枪弹、炮弹，而我们却用来造爆竹。如此等等。

假如说“黑色染缸”说主要是对反动统治者的揭露，那么，对于“国民劣根性”的针砭便主要是对大众的警钟了。鲁迅一向强调“立人”，认为“人立而万事举”。而几千年的黑暗专制统治，却把广大人民群众变成了奴隶、奴才，不能自立，更无法自主，恶性循环，中国便愈益愚昧落后，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

鲁迅曾经认真总结过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这在他的小说、杂文中表现得很清楚。而在书信中，也同样有发人深省的表述。比如，在1925年3月的一封信中，他曾对许广平谈起1913年“二次革命”后革命形势和社会风气之日渐其坏，他说：“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①

这样强调“改革国民性”，一度被人们认为是鲁迅前期的思想局限。但事实上，即使在鲁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也并未放弃这个观点。比如，在《三闲集·铲共大观》中，面对长沙民众争看共产党被害烈士的头颅和女尸的现实，鲁迅沉痛写道：“我临末还要揭出一点黑暗，是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乱，清末党狱，民二，去年和今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经目睹或耳闻了好几次了。”^②

在鲁迅看来，社会丑态、病态之所以层出不穷，一半因为统治阶级的腐败堕落、寡廉鲜耻，一半即因为公众的愚昧落后，无以自立。而最为可怕的便是他们身上的奴隶主义与奴才哲学。民众长期的奴隶命运，不应由民众自己负责，这是长期专制统治的结果。但是，如果心安理得于这种奴隶命运，甚至讴歌这种命运，那么，他就从无辜的奴隶沦为可恶的、“万劫不复”的奴才了。而这种“奴性”，恰恰相当普遍地存在于国民中。这种“奴性”向两极发展：对上谄而对下骄。在上司面前奴颜婢膝，摇尾乞怜，而在下属面前则神气十足，不可一世。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更凶狠：“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子还十足，还可笑。”^③

鲁迅后期身居上海，处于血火交织的残酷白色恐怖中，更对上海社会特别上海文坛进行了细致观察和深入剖析。他曾有诗云：“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赠邬其山》）所“见”者，即白色恐怖下上海（乃至全国）社会的种种病态特别文坛的种种怪相。十里洋场的帮闲、买办、西崽、胥吏、富商大贾、流氓地痞、虔婆暗娼……都一一摄入了鲁迅的镜头。至于文坛上各类人物的嘴脸，更是维妙维肖，毫发毕现。在鲁迅后期书信中，出现最多的要数“文氓”。鲁迅这样形容此辈特点：“另有文氓，恶劣无极，近有一些人，联合谓我之《南腔北调集》乃受日人万金而作，意在卖国，称为汉奸；又有不满于语堂者，竟在报上造谣，谓当福建独立时，曾秘密前去接洽。是真欲置

① 《鲁迅全集》第11卷，第31页

② 《鲁迅全集》第4卷，第106页。

③ 《鲁迅全集》第4卷，第302页。

我们于死地，这是我有生以来，未尝见此黑暗的”。^① 又曰“此辈心凶笔弱，不能文战，便大施诬陷与中伤，又无效，于是就诅咒，真如三姑六婆，可鄙亦可恶也。”^②

“文氓”的一个分支，即所谓“粪帚”文人。鲁迅写道：“吾乡之下劣无赖，与人打架，好用粪帚，足令勇士却步，张公资平之战法，实亦此类也”。^③ 张资平本不过一黄色小说家，进一步堕落为“粪帚”文人，乃在他无端攻击《申报·自由谈》编者黎烈文“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以谋得一编辑以自豪”。含血喷人，无中生有，无异用“粪帚”打人了。

二

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鲁迅说过这样一段有名的话：“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④ 这种“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态度，必然伴随着对“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渴求与倡导。一本《两地书》，与其说是鲁迅、许广平的情书集，不如说是关于“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讨论集。鲁迅说：“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但正在准备毁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⑤ 这里的“毁坏者”，就是敢于和善于向旧社会、旧文明发动袭击的人：“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万一之希望。”^⑥

基于这种“袭击旧文明”的需要，除了充分利用《晨报》和《京报》的副刊，鲁迅和朋友先后创办了《语丝》和《莽原》。众所周知，《语丝》的主将和灵魂就是二周（周树人、周作人）兄弟。该刊是我国现代期刊史上第一个以刊登杂文、短文为主的杂志，在《发刊词》中即彰明较著地强调进行“社会批评”和“思想批评”，整个刊物猛烈抨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社会的腐败和陋劣以及大众思想的愚昧和麻木，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其文风，正如鲁迅所说：“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⑦ 因此，它被反动北洋军阀所忌恨，创刊三年即遭到查封，而不得不易地上海出版。

《语丝》创刊约半年，鲁迅又和未名社的一些青年朋友创办了《莽原》，开辟了“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另一战场。其特色同样是“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实，望彼将来”，^⑧ 对反动统治和落后思想施以猛烈袭击。但在创办之初，鲁迅却在信中向许广平倾诉了他的“苦衷”：

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敬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可惜所收的至今为止的稿子，也还是小说多。^⑨

鲁迅以小说名世，但他却嫌当时小说稿子太多而“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稿子却太少，这就

① 致郑振铎，1934年5月16日，《鲁迅全集》第12卷，第414页。

② 致姚克，1934年3月24日，《鲁迅全集》第12卷，第359页。

③ 致黎烈文，1933年7月8日，《鲁迅全集》第12卷，第194页。

④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

⑤ 《鲁迅全集》第11卷，第26页。

⑥ 《鲁迅全集》第11卷，第32页。

⑦ 《鲁迅全集》第4卷，第167页。

⑧ 《鲁迅全集》第8卷，第424页。

⑨ 《鲁迅全集》第11卷，第63页。

足以说明,鲁迅对“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重视程度,已经远在小说创作之上。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当时迫切需要的是对社会腐败、文明衰微的直接的抨击,小说在这方面就显得迂曲而乏力了。

鲁迅从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算起,直到1936年去世前夕,他一直用杂文形式进行这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这可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韧性战斗。1935年岁暮,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中,鲁迅做了这样一个小小的统计:“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①事实上,鲁迅杂文的总字数,远不止此。如何看待鲁迅这个漫长的杂文创作历程?如何看待他留下的近二百万言的十七本杂文集?^②已成了聚讼纷纭的学术难题。有人说它们是“骂人文选”;有人说它们是“生命浪费”;有人说它们“不是文学”;有人则说鲁迅后期专写它们是“江淹才尽”。不能不说,这都是一些不能成立的误解与偏见。从整体上说,鲁迅杂文不仅是文学,而且是有卓越技巧和永久生命的优秀文学。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散文的一支劲旅,也是世界现代散文的一束奇葩。它的那些代表作品,比起蒙田、培根、兰姆等世界级散文大师的名篇,一点也不逊色。而且,从“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角度说,鲁迅也恰恰借鉴、继承、发展了这些世界散文大师。鲁迅晚年不再写小说,就中国现代小说而言,也许不无损失;但是,他的杂文的丰收却弥补了这种损失。现代中国当然需要《呐喊》、《彷徨》那样的优秀小说,但同样需要(假如不说更需要)鲁迅那样的优秀杂文,二者是无法分出高低上下,也绝非互相排斥的。

三

鲁迅杂文之所以可贵,他那些“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之所以精彩,当然离不开它们的及时和文采,它们不愧为“感应的神经”和“攻守的手足”;但更重要、更根本的,则在它们的深刻性、哲理性。有人不了解这一点,他们以为鲁迅杂文仅就一时一事而发,时过境迁,时移势易,这些杂文无论当时多精彩,也都失去了存在价值,不足以继续流传了。这是一种莫大的误解与皮相之谈。不错,一般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也许随时光而流逝,鲁迅就很希望他的文字能随被针砭的社会病的灭亡而灭亡。但是,社会病态根深蒂固,病态社会更不容易轻易灭亡,因此“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生命力往往超出人们的估计,也往往超出作者自己的预期。鲁迅杂文正是这样。鲁迅杂文很少就事论事,而总是即小见大,由近及远,从眼前似乎十分平常的事件生发开去,从中生华出精辟的见解乃至永久的哲理。这里,我们不妨信手举几个例证。

中国的改革和前进,是鲁迅最为关心的课题。他对社会病态的针砭,总是以此作为出发点的。早在“五四”时期,他就大声疾呼:“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因为“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而当时腐朽老大的中国和它的愚弱的国民,恰恰缺少这些要素。^③但想要改革,推动中国前进,却比登天还难:“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

① 《鲁迅全集》第6卷,第451页。

② 鲁迅生前编定十五本,鲁迅去世后许广平编成《且介亭杂文末编》,新版《鲁迅全集》编委会编成《集外集拾遗补编》。

③ 《鲁迅全集》第1卷,第307页。

的。”^①而“改革者”的命运，则往往十分悲惨：“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留存，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②因此，改革者必须既要有向社会陋习和恶势力战斗，以最大的牺牲精神、以血的代价换取社会的发展和前进的勇气，更要有锲而不舍的韧性战斗精神。鲁迅对中国改革的上述认识，至今看来仍然是尖锐、精辟、深刻、独到、发人深省的。

对中国官僚体制的弊端，特别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们办事效率之低，鲁迅也曾有入木三分的剖析。以他所在的旧教育部为例，那些肥头大耳的总长、次长们，并无意办教育，“十之九是意在做‘当局’的”。“教育”界的多如牛毛的问题，他们眼睁睁看着不去过问，不去解决，却安坐在他们的教育部里喝茶、抽烟、“看条陈”、做“当局”。假如您认认真真去和这些官老爷谈教育，就只能是对牛弹琴，自讨没趣。鲁迅说他的“这一种学识，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总长，这才陆续地获得，轻易是不肯说的。”^③这样一种独到见解，在鲁迅杂文中是并非个别的。

深刻、独到的极致，是引发出很多哲理性思考、哲理性名言。鲁迅虽然并非哲学家，并无写下什么哲学著作，但他的哲学思想却是自成体系的。^④因此，在他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中，就经常出现言简意赅、耐人回味的高度睿智的哲理名言，从而使他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比如，在谈到“先觉”和“小人”时，他说：“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⑤在谈到谣言诽谤之类时，他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⑥在鞭挞“帮闲文人”时，他说：“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⑦又说：“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⑧举不胜举的哲理名言，都已经进入了经典名言的宝库，它们将永远闪射熠熠光彩。鲁迅的有些杂文，象《华盖集》中的《忽然想到》，象《华盖集续编》中的《无花的蔷薇》，象《而已集》中的《小杂感》，象《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的《半夏小集》等，通篇皆由一则又一则的哲理名言联缀而成，那更是让人百读不厌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上乘之作。

哲理，自然蕴含着历史的规律。鲁迅一向认为：“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⑨正因为深明此义，加上他对中国历史的熟稔，在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时，鲁迅便往往能够古今交错，将今类古，以古鉴今，在对病态现实的剖析中渗透进历史的经验教训，这使鲁迅的整个杂文无形中成了一部风格独特的厚重的历史，使他的批评更具历史的深刻性和社会发展的预测性。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充分论证鲁迅“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丰富内容，此文挂一漏万，仅意在向社会学界的朋友们推荐鲁迅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作一小引，以共促今天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

责任编辑：张 琢

① 《鲁迅全集》第1卷，第164页。

② 《鲁迅全集》第3卷，第457页。

③ 《鲁迅全集》第3卷第464页。

④ 参阅张琢《鲁迅哲学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⑤ 《鲁迅全集》第8卷，第89页。

⑥ 《鲁迅全集》第4卷，第617页。

⑦ 《鲁迅全集》第5卷，第272页。

⑧ 《鲁迅全集》第5卷，第198页。

⑨ 《鲁迅全集》第4卷，第525页。